

重庆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198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一月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0.80 元



中共中央祝賀

吳玉章同志六十大壽

敬爱的王章同志：

當第六十壽辰之日，我們特向你致熱烈親切的祝願——你在六十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是過的不命定的戰鬥的生活。

你是中國革命前進的覺悟的老戰士，你始終是如燃的，你始終是走在時代的前頭，因此，你始而參加了同盟會的領導，繼而參加了國民黨的領導，進而參加了共產黨的領導。你是革命戰線的組織者，你是革命戰線的參加者，你是革命戰線中紅紅綠綠的英雄，你是一九二七革命的領導者，亦現在是我黨的優秀的領導人和全國人民最高貴最重慶的代表，你的生活和鬥爭，是幾十年來一貫的中國革命史的縮影。

你這我黨可貴的歷史專家，你的國情，
我黨和中國人民，都是極端可貴的寶藏。

你不僅是中國教育界文化界的前輩，而且是青年男女先進的導師。你對青年男女的誠心和愛護，你的為人可佩的精神，給與青年們以無窮的鼓勵。

你是中國新文字的創始人之一，你對新文字的貢獻及提倡新文字的熱忱而堅毅，已在中國新文化發達的道路上，放出了燦爛的光輝。

你是中國革命的老前輩，中國共產黨的布爾喬亞維克，你對黨對人民解放事業的忠誠，你的崇高的人格，你的革命的道德，你對同志對人民真摯的熱愛，你的堅苦耐勞並其切實的行動，將永遠成為所有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的模範，你的事業，就是中國革命和人類的解放事業，你的事業一定會在中國和世界人類解放事業的光榮勝利中，取得偉大的事實！這一定會在全中國和全世界勝利的。

茲以無量敬祝你健康長壽，祝你繼續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類解放事業的先驅勝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五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的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父英雄兒
好漢
父子相繼
勇使工农把
身翻
朱德
1946.3.31.

朱德同志为李鸣珂烈士儿子李从柯题词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漆南薰烈士墓



四川省江津县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在江津县李市区
隆重举行漆南薰烈士殉难五十四周年悼念仪式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目 录

六十自述 吴玉章遗作(1)

刘伯承在四川的早期革命活动 杨传怡(34)

关于泸州起义诗的考证 陈石平(53)

杨闇公生平事迹补遗 郑洪泉(55)

杨闇公史实材料订正

.....《潼南县志》编纂领导小组(62)

记四公漆南薰 漆泽邦(64)

李蔚 ~~如佳略~~ 胡汉生 蒲国树(81)

李鸣河在重庆的斗争 王 斌(126)

✓ 肖楚女在重庆《新蜀报》 郝 谦(149)

肖楚女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 鲁 丁 康 涛(158)

重庆公学简记 管文虎(163)

万县“九五”惨案 马宣伟(171)

“九五”惨案见闻 杜钢百 徐庆坚(189)

六十自述*

吴玉章 遗作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承我党中央为我六十生辰开盛大的宴会，并赐以祝辞。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中央诸同志，国民党代表高仲谦同志，我革命老战友林伯渠同志，及边区政府、马列学院、党校、抗大、女大、陕公、妇委、青联、青委、文协、鲁艺，各机关，各法团的同志赐以演说、诗篇，宠以文章、祝辞，使我十分感激。我以为我党此举实以我四十年始终无间断地从事于革命，始终忠实不变，有一长足述，并非寻常应酬可比，故在席间略述平生之经过以表谢意。解放社、新中华报社、中国青年社、中国妇女社诸同志嘱将所说记出登诸报端，因将演词略加补充写成此稿。

玉章附记

盛会难逢，辱承我党中央为我六十生日开此盛宴，心中无限感激。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说我难能可贵的是四十年如一日，经过各时代的革命而始终忠实于革命的精神，足以使有心人兴起、变节者愧作。我四十年革命老战友林伯渠同志宠以美文，锡以诗篇，

* 本文根据吴老手稿整理，现征得吴老亲属蔡乐毅同志同意，交由本刊发表，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编者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相比拟，其他许多同志的祝辞中都以我意志坚定，始终站在各时代革命的最前线艰苦奋斗，可以作革命职业家的模范。回顾我六十年的生涯，今天还能蒙诸同志和知交的见爱，特别是受人类最先进、最优秀的我波尔塞维克党的同志见爱，这是我无限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我想我所以能有此幸福的原因有二：

第一，把旧道德和新道德结合起来坚强了我的操守。也可以说以共产主义的道德来发扬光大了中国的旧道德；第二、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寻得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可以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来实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原来我弟兄姐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出世时父母年龄俱在四十以上，身体十分羸弱，人人都以为此子未必能养得活，而年近八旬的祖母及我父母却非常钟爱，十分注意来抚养，时时以戒慎恐惧之心来看护，并时时申儆之曰：“从艰难困苦中长成的人才更有用处。”我因此就受了很大影响，不敢自暴自弃。我祖母是一有名的节孝者，爱整齐严肃、清洁勤俭，极讲究卫生，极恨烟赌，不许妄取人物，尝戒童孩曰：“小来偷针大来偷金，不义之物宁饿死不接受。”我父母也极孝顺，中农的家庭，衣食勉强足以自给，世世以耕读传家。我父极爱书，但以务农管家，不能遂其求学之愿，故亟望其子学有成就。他尝说：“汝等必须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我二哥十九岁即入学为秀才，使我家老人稍慰。我小时颇聪明沉静、老实可靠，家庭儿童应作之事，如洒扫庭除、整理什物等等都能负责完成任务。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不需大人督责；不放肆、不轻浮，循规蹈矩，有大人气概。亲朋见着必誉之曰：“此子必能有成！”我八旬余的祖母稍慰之余尝戒亲朋曰：“不要过于夸奖他，锅盖子揭早了会出气。”（乡间用大

锅烧开水，如水未真开，锅盖揭早了水就难开。这是一种毋使骄傲的警语。)而我倾听之余内心常自矢曰：“必不负你们之望！”我作事必有始有卒，以求贯彻，偶觉疲劳欲辍，则心中自儆惕曰：“这不会貽笑于人吗？”于是又忍耐下去必使事之完成而后已，虽有时也不免困难，觉得毅力终能克服一切，于是提高了我的自信心。我六岁开始念书，记忆力甚强，了解也不坏，怡怡然颇算一幸福之家庭。不幸七、八岁时我父就去世，十一岁又丧我八十六上寿、清明在躬、气志如神的祖母，十三岁又失我的慈母，母以急病死，我随仲兄应试在二百余里外之嘉定，奔丧回家，哀痛几绝。我两兄以我少无父母，苦心担任教养。我长兄务农理家，仲兄读书求学(后来他们都到过日本加入同盟会)，他服膺宋儒理学，性至孝，母死庐墓三年，不茹荤酒。他喜购书籍，一到大都市，总买盈筐之新书归来。每至负债累累，家贫至不能偿，然而长兄为之筹措绝无怨言。母死后家居，我与仲兄二人常于夜间对坐共读通鉴辑览，仲兄圈点，我则对看，一灯荧然，每至更深。看到古人忠义节烈、至诚感人言行，未尝不废书相与咨嗟太息，甚至痛哭流涕。如诸葛亮《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岳飞之《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及其就义前所作的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是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以及史可法的《复多尔袞书》，义正词严，未尝不反复咏叹仰慕古人之高风亮节。我这时极喜读《三国演义》，深庆诸葛亮的足谋、关云长之义勇。我家雇一伙房，他虽不识字而极爱看戏，他锄地时，我就在旁听他讲三国的戏情，二人极相得友好。当时正是甲午我国与日寇战败求和之际，我与仲兄接读光绪乞和之诏时，不

禁相抱痛哭一场。因为我们极喜欢读明末烈士黄淳耀所作《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文，中有“一则放之须臾而已与草木同腐矣；一则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增光矣。”又知道他在满清兵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殉国时，先把亲爱的妻子缢死，再把其十三岁极聪明的爱弟上吊，然后说：“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遂从容自缢而死。所谓一门死节，不愿苟且偷生作亡国奴。他在文章上说得出，他在行动上做得到。这种模范的人格，真要愧死无数汉奸卖国贼。所以吴梅村是当时极有名的诗人，投满清后只得入贰臣传，临死时作可怜的最后悔恨的哀鸣。他说：“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思往事，倍咽噎。”一则流芳千古，一则遗臭万年，稍有心肝的人自然知所选择。我们弟兄当时之所以痛哭，因为有感于国事之阽危，正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时。我弟兄都很老实，又加以有宋儒重实践的理学，胸中有了许多动人的史实。因而尝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期许，想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我尝想以坚忍沉毅四个字来作我行动的指南。

甲午战事以后，列强瓜分中国之说流传极盛，而变法维新之说亦到处流行。我们爱读新书报，如《时务报》、《万国公报》、《蜀学报》、《经世文》正续新各编、《天演论》及康梁的言论等等。到了戊戌变法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校时，我就眉飞色舞异常高兴，实际上我成了我邻封各县的一个新政的宣传者。不久政变起，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乡间顽固份子有嘲笑者，我仍不屈不挠，力说不久新政仍要实行。并将谭嗣同在被捕时，英使馆派人劝其到使馆避难，他谢绝并慷慨的说“万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之人，请自谭嗣同始”的这一段英勇的事迹来答复他们。我俨然成了新政的辩护人维新派。

随后庚子义和团之变，八国联军入京，四川也有余蛮子之乱，到处打教堂、杀教士，但同时却把教堂内的许多地图及一些新的、奇怪的、科学的器具书籍散布在民间，使民间更添了新知识，知道一些世界情形，而要听我讲故事、说国内外情形的人越多，我就乘此时机把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报》、《选报》等广为宣传。这时候我附近各县的青年学生都叫我作讲时务的人。一般先进青年对我极好，都围绕在我周围，后来到日本留学，许多都成了同盟会会员。我也极爱读曾国藩家书和他的言论与事迹。有人说他捉得李秀成后秘密一人审问了三天，李曾力言能辅其称帝推倒满清，曾曾深思三日，终决其不可，因为他怕后世在历史上书他为叛逆。我也曾误认为他能保持旧道德。戊戌政变后，西太后欲废光绪帝，闻曾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他答复说：

“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逃，臣所敢言者在此，臣所不忍言者亦在此。”我也觉得为人臣者当如此。但又因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四川失败，他的文章与英勇事迹也使我佩服。我读了黄黎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黄书》、谭嗣同的《仁学》，更读到《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觉得洪秀全等的造反是对的；看见梁启超有不少革命的言论，以为他也是一个革命者。他之所以要保皇，是因为他受了光绪的厚恩，如曾国藩、刘坤一等一样。士为知己死、忠臣不事二主等的道德观念，使我发生许多矛盾的意见，也曾认为他们也未可厚非还是对的。

一九〇三年我同仲兄到日本留学，刚到就遇着拒俄学生会的风潮。这会派代表到北京请政府出兵迫俄国沙皇退还旅顺口，清廷不仅不采纳反要捕人。不久这个团体就变成了带革命性的军国民教育会，我是热心参加这个运动的。我又看了许多欧洲革命史及卢梭天赋人权之《民约论》，就感觉到中国的旧道德，特别是所谓

君臣之义、大义名分等道德观念是重私情而忘公益，只看局部而不看全体所谓见树不见林的片面的道理。如满清以异族统治压迫汉族者二百余年，其入关时之残暴及其压迫手段之阴险，汉族子孙即使不讲新的民主主义只讲旧的民族主义，也应为祖宗报仇才能算尽忠孝之道，如章太炎等的排满复仇主义都比曾国藩、康、梁等靦颜事仇、认贼作父高出万倍。所以当时我的道德观念一变，认为推倒满清的革命主张是对的，不仅为光复我汉族的国家应革命，即为争天赋人权、民主主义也应革命。法国革命之杀路易十六与孟子诛独夫民贼相合。我同行赴日的邓孝可，他是最崇拜梁启超的人，他沿途与我甚相得，本来相约到日本后即去见梁，因我思想变迁，又以当时革命派正同梁之保皇思想斗争，故不愿去见梁，而邓则到不数日即赴横滨拜梁为师，终成为梁之信徒，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他认为他是尊崇旧道德，我认为他是毁损旧道德，不能把旧道德和新道德联系起来。当时念书稍多的人所谓士大夫之流多鄙视孙中山先生，认为他是下流盗匪之徒，杀人放火不讲道德，如现在有些人之诬蔑共产党一样，且说他未念书不识字，满清通缉他，把“文”字加上三点水作“汶”，以表示他非人类、是贼匪，人人得而诛之。然而我们革命的人却非常欢迎他，一九〇五年他到东京，我们就组成了同盟会，大家听了他的三民主义讲演之后，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相誓约。这个三民主义的纲领是能把国家社会的新道德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德建立起来，把旧道德发扬光大。因此就团结了广大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到同盟会来进行革命。在这几年革命运动中，我是以革命必胜的自信心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一九〇五年所谓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大风潮失败后，对

于团结学生的一个群众组织“留学生会馆”无人过问，我一人支持了九个多月，终于感动了他们，大家又热心来恢复了组织。一九〇七年以后革命起义到处失败，革命低落时代叛变的、灰心失望的、变节以求个人出路的颇不乏人。东京所留革命者已无几，当时我办《四川杂志》，章太炎维持《民报》，其困苦艰难，常至断炊，我竭力奔走筹措，得以勉强支持。一九〇八年《四川杂志》与《民报》同时被封闭，且判我半年监禁之罪，以学生故犹豫执行。这时革命低落和各国一样，发生了暗杀之企图。自徐锡麟刺恩铭后，许多暗杀计划在党中颇逐渐实行，如把守长江口之端方与把守西江口之李准，皆在剷除之例。这时汪精卫在南洋香港一带，我忽得他一函要我给他寄炸弹去。我去信说：“徵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知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行可嘉，其志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处处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兄为吾党有名而能文之士，如果也随吾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使有成也徒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而党也受莫大的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他回信说：“来信爱弟深挚，令人感激。但弟以为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二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燬，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二者之为德孰轻孰重颇难轩輊，要在各视其性之所近择一而行之耳。弟自顾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兄如爱我，望即赐寄各物。”我见他如此坚决，也就与他寄些炸弹去。但他在香港谋炸李准不成又到东京来，我又为炸摄政王布置一切，派喻纪云、黄复生到北京开守真照像馆筹备了半年之

久。一九一〇年汪与陈璧君到北京，不久而汪与黄被捕，汪此时尚能慷慨供陈革命大义，使满清不敢杀而监禁之。因而汪之革命声誉也震动一时，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谁知他今日竟成了日寇走狗、汉奸国贼，《三国演义》上有一首诗骂曹操的奸诈，现在拿来骂汪精卫很是恰当。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现在汪逆精卫比秦桧的卖国求和尤为无耻，他必死于万人痛骂之下，他的巧言令色已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我觉得我有许多药石之言可为教训。当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次国会开幕时袁世凯花了许多金钱来收买议员，以致国民党本有大多数议员而不能选出一个议长。在选举争斗过程中，国民党也用一点金钱来收买，我一听说就非常反对。我说：“国民党的金钱必不如袁世凯多，与其因钱少而失败，毋宁不用一钱以保持正义。如果我们初行民主国会制即用金钱收买，民主政治就根本垮台，袁世凯钱多，外国人钱更多，将来整个国会会被人收买。”他们不听，空花了二、三十万，议长仍未争得，以致随后有曹锟贿选总统，现在有汪精卫出卖祖国的痛心之事出现，真是不幸而言中。

我也好打抱不平。一九一八年政学会杨永泰等与广东军阀莫荣新设计推倒孙中山大元帅的护法政府而改为七总裁的广东军政府，为假借中山先生的革命名义，虽拥岑春煊为首而不能不分一席总裁的位置与孙中山，政府成立时我为四川代表，他们以我为中山所信任，派我去说中山就职，我到上海见中山先生时，他正病在床上，我为叙述成立政府及要他就总裁职并派代表等情，中山先生很愤激的说：“我不愿与他们为伍。”我说：“我们作革命运动的人，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脱离政治舞台。现在他们不得已

勉强表示与你合作，如你谢绝，正如他们所愿。他们还假护法的招牌，群众还不知他们的坏处，故必和他们合作以表示巩固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之苦心，不要看岑春煊今天烜赫一时，如不好好作去，不久受人奚落时，恐怕有甚于先生今日的恶劣环境百倍。”中山先生感我此言，泫然泣下曰：“我听你的话，派精卫去作代表。”当然中山先生仅存的武力只有被排在漳州的陈炯明的队伍，他们千方百计想要限制他、消灭他，我在政务会议上总是和他们力争，卒能保存其势力为后来中山先生返广东之用。

我深受了“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教训，对于金钱十分慎重。当我到日本一年多以后欠学校学食费很多，其时我同县到日留学者颇多，大家想为我一人请公费，以为我为资格老而请一人之费较易，我不愿一人独享权利，主张家贫须补助者联合起来去请求，因人多固然无结果。我做事以克己为主义，常愿多尽义务少享权利，赴义争先，分利居后，因而常常引起正义感的人注意，反而都为我争或群相告戒为我留一份，结果常常所得更优。礼让之风可以感人，此为我民族的美德。我对于名利都看得很轻，以争名夺利为可耻。民元正月，我由四川到南京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内务部次长居正、秘书长田桐一见我就说：“可惜你来迟了，各部次长位置已经没有了，内部的司长、参事随你选择一个。”我说：“我们革命不是为做官，请不要提这个。”随着他们就送了疆理局(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来，不收，又送参事的委任状，我都璧还了。南北和议成后，四川成渝两个军政府犹在对立，袁世凯托人向我说，要我作宣慰使到四川去调停。我答复说，“我不做官，且对故乡父老何来此种名义？”后袁以派往四川慰问，不用任何官职的名义，强我为国家统一而努力，我才同朱芾煌前往四川一行。我们每人的薪水是六十元一月。有人问我，以都督